


刘增杰 关爱和
主编

中国 近现代文学思潮史

(上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
文学

中国
近现代文学思潮史

1911

中国文学思潮史

刘增杰 关爱和
主编

中国 近现代文学思潮史

(上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绪论 文学的潮汐

刘增杰

19世纪上半叶,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思潮相继突奔涌动于欧洲文坛的时候,远在东方处于相对隔绝地理环境中的中国文学对欧罗巴土地上的喧闹浑然不觉。它依然我行我素地在传统艺术的矩阵中高蹈徜徉,孤立孑行。此时,清王朝乾嘉盛世的釉彩正一块块脱落,从浩如烟海的经史书卷中熟谙盛衰之机的封建士人,在山雨欲来、风声鹤唳之中,嗅到了变局在即的气息。他们像惊秋之落叶,向全社会发出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危机预告,惊盛世之秋,救衰世之敝的呼喊,拉开了近代中国文学思潮的序幕。它所显示的忧患意识与悲凉之气,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情感。

之后,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用罂粟花与炮舰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已久的门户。侵略者的强暴行径,打破了天朝盛世万世长存的梦幻,也粗野地蹂躏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主权观念。中国以被迫的姿态和充满屈辱的地位,开始了同世界的对话与交往。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帝国主义不断将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前赴后继探求民族新生之路的过程。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人也在极力张扬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行着重铸民族灵魂和“周邦虽旧,其命唯新”的伟大事业。在血与火的历史变革与演进中,中国文学开始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新岸与旧梦的悖反,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对传统文

学的取精用弘,扬弃取舍,对异域文学的吸收借鉴,融汇整合,星换斗移,潮涨潮落,辞旧而迎新,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步履蹒跚。但它走向新生的阵痛,构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比作一出长剧的演出,那么,近代文学的发展正恰恰可以看作是它的序幕,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是为这场演出所作的实际准备,架设的一个宽敞多姿的舞台。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近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关爱和等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说,近代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发轫、准备与起步,那么现代文学革命则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高潮、第一次飞跃。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文学革命是在近代文学变革基础之上的更深入全面的发展。现代文学不仅继承了近代文学的反帝反封建和启蒙主义优良传统,而且把近代文学从思想文化到文学形式变革的成果也都继承了下来。近代先驱者们的历史悲剧也从反面启示了后来者。现代文学革命的起步,不仅包含了对整个传统文化与文学的深刻反思,同时也包含了对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联系。”^①这一认识,经过磋商研讨,终于得到了本书所有撰稿人的普遍认同。

当然,这一认同也还远远不能够说明我们把19世纪文学作为文学走向现代进程起点的全部动机。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的结束语中,勃兰克斯在谈到他撰写该书为什么以19世纪作为起点时说过:“整个一个洲的半个世纪的文学史显然不可能是在哪一个特定时刻开始的。文学史家选择一个起点总不免有些武断和偶然。他必须信赖他的直觉和批判能力,否则他永远没法开始写作。”不能不说,我们撰写本书时,同样遇到选择起点的困惑。寻觅到作为文学史起点的唯一“特定时刻”是不可能

^① 关爱和、解志熙、袁凯声:《〈中国近代文学史〉绪论》,《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的。我们选择 19 世纪初年作为论述的起点,虽然也有如上述的种种理由,但显然也有如勃兰克斯所云,“总不免有些武断和偶然”。驱使我们作出抉择的,可能也竟是在阅读史料时产生的一种朦胧的感觉,感受到的那一丝并不十分明显的文学新潮开始在传统文学母体中骚动的信息。

也可以这样认为,这一起点的选择,还来自我们无法掩饰的对于研究对象的偏爱。我们似乎看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长达两百年的文学之河的流动,看到了它那由滞而缓,由缓而急,急中有回流,回流中又有新的冲决和流变的节奏变换,以及在变换中所呈现的特有异彩。停滞孕育着突破。曲折中包含着丰富。中国文学之潮裹挟着泥沙,以百川聚海般的气势走向未来的阵阵涛声,鼓起了我们跃跃欲试的热情,并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投向以 19 世纪为起点的中国两百年文学思潮世界的追踪。我们在这里坦诚地剖白个人的偏爱,意在说明:我们绝不想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或者借用胡适的话:“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①也许可以这样认为,我们的这一选择,充其量只不过便于陈述我们的思想观点。

二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化史上,近现代是风云诡譎、沧桑巨变、沉重而又辉煌的历史时期。与古老的封建制度揖别,扫荡旧时代的污泥浊水,经历凤凰涅槃式的痛苦走向民族的新生;摆脱殖民主义的奴役,挺直民族脊梁,以东方巨人的雄姿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自新与救亡图存,是特定时代、特殊的民族生存环境,赋予近现代中国人无可选择的历史重任。国家、民族的生存与进步,以无形的力量,从总体上规定与制约着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家的感情范围与感知创

^① 《寄陈独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 53 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年版。

造。同时,也给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学作为时代与作家情感的反映,它必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社会变革、民族更新呼吁,为反帝救亡、民族生存呐喊的使命。龚自珍等一代志士对封建末世衰颓之象的揭露和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若受电然”,心弦为之震动。梁启超倚重文学策动新民救国风潮的苦心,在“五四”文学青年群体中得到了广泛反响。改造国民性,以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方式,抖落民族文化性格中迟钝、麻木、愚昧、沉闷和惰性的因子,呼唤深刻的、全民族的精神洗礼,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家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优秀传统。同时,不断降临的民族灾难与民族战争,疮痍满目的现实世界,也吸引着众多文学家自觉地为自身与民族的生存解放而呐喊,用文学的手段张扬民族精神中勇敢无畏、百折不挠的生命意志,增强民族抵御外侮的凝聚力,筑起心灵与情感上的万里长城。以巨大的热情和自觉,参与历史变革的进程,与民族的文明进步荣辱与共,这就是近现代中国文学最鲜明的思想特色。

这里,我们还想从一个新的视点、从救亡社会思潮以及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战争对文学思潮影响的角度,来进一步探寻近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形态的总体特征。

从19世纪初年西方“罂粟花文化”传入起,作为与之对抗的中国救亡文化、救亡文学就应运而生。如果说鸦片战争文学是近代救亡文学的第一曲战歌,那么戊戌变法时期诞生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则可以说是救亡社会思潮催生出的坚实的文学果实。“五四”文学诞生于中国蒙受新的民族屈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浓重的救亡色彩浸染于大量的反帝反封建的作品之中。至抗日战争时期,救亡社会思潮更成为普遍的时代情绪和文学心理。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这些文学思潮的发展,都和救亡社会思潮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甚至现代主义思潮的若干作品,也具有着救亡文学的某些特色。民族救亡,既是笼罩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氛围,也是形形色色文学流派创作中的基本主题。

民族奴役还是民族救亡,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侵略者斗争的焦点。这一斗争最激烈的形式是战争。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战争与动荡始终是弥漫于中国文学上空的怪影,连年不断的内战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此起彼伏;进入 20 世纪之后,这些战争又和两次世界大战紧密呼应。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军阀混战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在反对侵略者的战争中,震耳欲聋的炮声,也抖落了民族惰性中的迟钝、麻木和沉闷,馈赠给我们以极为深刻的精神洗礼;国内战争唤醒着广大阶级、阶层的阶级意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地为自身的生存权利而战;民族解放战争更引起了民族意识的极度高扬,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文学观念的嬗变、文学价值取向的转换、作家感情意向的选择,带来了创作内容、题材、主题、风格、形式、语言的一系列变化,简言之,战争直接制约着文学思潮的流向。例如,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战争所带给作家心态上的危机感、紧迫感、焦虑感,迫使作家直面现实,作出新的审美选择,以服务于民族救亡为己任。战争也直接影响着读者的心理。战争催发了读者对于英雄的渴望与期待。人们希冀英雄出奇制胜,化险为夷;赞颂英雄为群体利益牺牲自我、为国捐躯的壮举。战争文学要求的是高亢、热烈、悲壮,枪林弹雨下怠慢了春意融融、云雾缭绕的幽情,不少作品充满着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不过,战争时期二元对立意识的强化,也使文学思潮的发展缺乏宽容的态势。我们看到的当时某些评论思潮的论文,往往表现出较少平等商榷,而较多一锤定音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以至几十年后读到这些文字,人们仍能品味出时代带给批评的几分酸涩。显然,这一批评风尚就和战时批评家的心理构架直接相连。战争也直接制约着中外文学思潮的正常交流,造成交流工作时断时续,并影响着翻译介绍工作的指向。译介工作中对某类作品的过分偏爱、厚此薄彼等等,都和战时的政治需要分不开。

中国近现代文学特殊的生成条件与环境,其所负有的特殊的历

史使命,使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在总体上显示出如下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现实主义占据盟主地位问题。现实主义概念的引入是20世纪初年的事情,而中国文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古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却源远流长。“五四”时期,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写实主义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和以个性主义为思想基础,以浪漫主义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浪漫主义创作潮流,双峰并峙,浩荡奔涌,蔚为壮观。随之,以象征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主义创作潮流也彗星般地闪现。它们给20世纪的中国文坛,送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新风。然而,世易时移,20年代末期以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虽然仍以各自的生存形态时隐时现地开拓着自己的文学疆域,而现实主义却迅速地发展为文学主潮,占据着20世纪文坛盟主的位置。文学思潮发展中这一格局的形成并非偶然,自有其强大的历史逻辑性将它们合理排演。第一,持续不断的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部中国人民暴风雨般战斗生活的编年史,争生存、求民族解放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基本要求和社会心理,直面社会人生、注目人间沧桑,及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现实斗争,成为多数作家长期的创作兴奋点。第二,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心态,使文学消费主体的欣赏趣味,明显地趋向于现实主义。第三,从20年代末期开始,新文学就始终处于左翼政治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和影响之下。世界左翼文化工作者和苏联文学工作者对现实主义的大力倡导,对中国现实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第四,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度,农民的思想本质上是朴素的、现实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现实主义主潮地位的确立,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探索上,人们也做过一些有益的思考,根据现实主义的发展变化,作出了种种新的概括,仅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抗日的现实主义”、

“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三民主义现实主义”、“广现实主义”、“再广现实主义”、“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等等提法；1979年以后，各种现实主义的名目也骤起骤落。撇开探索本身的功过不论，单是这些理论的提出，也已经隐约地显示了现实主义作家为了给现实主义开拓广阔的道路，建立现实主义的多种形态，发掘现实主义新的审美品格，曾经有过何等值得重视的思考。但是，也应该指出，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思潮所表现出的独树一帜的气势，褊狭的理论个性，对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印痕清晰的限制。更不必说“文革”时期那种以政治权力为强大后盾的“假大空”的伪现实主义和“三突出”戒律对文学生命的残酷窒息和摧残。

二是由于思潮发展的过分匆促所带来的体系的不完整性。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近现代是变革的时代，是匆忙的时代，是浮躁的时代。急遽而跳跃的时代节奏，中西文化大碰撞所带来的紧迫感，造成了人们难以抑制的浮躁心理，面对救亡与启蒙的历史重任，人们似乎总想在一夜之间挣脱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积淀的重负而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结果思潮的发展往往如鲁迅所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①，从而造成了文学社团和刊物开张与倒闭孪生的奇特现象；也如郑伯奇所云：“回顾这短短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番”，“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②。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竟对“五四”十年的“匆促”与“杂乱”重新上演了一遍。这种犹如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然杂陈的思潮更迭，在文学创作上，有时也带来了轻率趋时，追逐时髦，华而不实的风尚。鲁迅20世纪30年代在《扁》等杂文中尖锐批评过的这种文学现象，此后远未绝迹。当我们回首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在赞赏其某

① 《扁》，《鲁迅全集》第4卷第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些优秀作品相继问世的同时，也常常为其缺乏更多史诗性的作品而顿生无限感喟。这种感触也许就和思潮发展的这一总体特征密切相连。

三

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是我们描述近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不能脱离时代和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去要求筚路蓝缕的拓荒者。重要的不是用今天的尺度和价值判断去评判文学先驱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应该把描述重点放到在文学园地他们做了什么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至于其他，则应该尽可能地留给读者。这诚如胡风所说，“举例说罢，因为自己享受到了文明产物的明晃晃的电灯光，就以为对于只能用松柴照明的时代的人们可以尽情地加以嘲笑，那并不一定就算得是‘高明的客观态度’”^①。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文学思潮史只是文学思潮的简单罗列和历史事件、文学现象原封不动的照搬。追求历史的现代化、历史的主体化，即以今天的视野回顾历史，通过自己的感受来把握历史，仍是我们在写作中企盼实现的目标之一。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复杂背景，使文学思潮的发展，呈现为错综复杂的形态。仅就一个作者而论，其政治、哲学、文学各方面的观点，往往就相当复杂矛盾：或政治立场上是革命派，而文学主张却是复古的保守派；或前期锋芒毕露，所向披靡，后期则消极保守，败下阵来，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②；就思潮发展来说，既有新旧思潮之间的回环交错，又有各种文学思潮的对

① 《为了明天·前记》，《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借用鲁迅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的话。魏连殳这句话的全文是：“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敬，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抗、排斥,以及相互之间的吸收、融合,乃至完全消融,文学思潮发展的这种充满着交叉、回环、曲折、多变的复杂情况,要求我们审视时需要历史主义的理性目光。决不能削足适履,人为地用一条线,像穿珍珠一样把它打扮得过分有序和清晰。我们更关注的是文学自身的本来面貌。文学思潮自身发展所呈现的某种模糊性和若隐若现的连贯性、规律性,也许才是人们所执著追求的它的庐山真面目。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零乱的、自在的文学思潮现象而放弃必要的爬梳整理和理论思维。

比利时科学家伊·普里戈金在一部研究当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著作中说:“本书叙述了一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是近年来为处理耗散结构的产生和变化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一些像主旋律一样在本书始终反复出现的关键词:非线性,不稳定性,涨落,它们已经开始把我们的自然观渗透到甚至超出物理学和化学的固有领域之外。”^①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话具有经典的性质,他所概括的研究方法,事实上使我们在研究文学思潮时获益匪浅。“非线性,不稳定性,涨落”,几乎指出了我们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也是我们向往的基本研究方法。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的涌动是如此的丰富和复杂,线性研究只能使我们陷于困境;而只有格外注目于思潮的涨落,才有可能梳理出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期,文学思潮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经常性的变动之中,这也是我们时刻应该把握的关键问题之一。伊·普里戈金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在文学思潮的研究中同样具有生命的活力。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对于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给予了格外的关注。美国学者R·韦勒克在其考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论文《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研究文学思潮,“最好不要脱离那一时代的基本

①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第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理论和公认的杰作”^①。我们对此颇有同感。群体性固然是文学思潮的本质特征,但这群体性如果没有足以代表它的杰出人物和杰出作品,也将黯然失色。鉴于此,本书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卓越的文学家、文学思潮家以及他们的杰出理论和杰出作品,都尽可能地作了重点描述,中国近现代培育出的世纪性人物,群星灿烂,辉映文坛。他们之中有:

敏感而又焦虑,呼唤“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向读者最早传递中国文学新潮涌动信息的龚自珍;

博学多才,呼风唤雨,高举文学改良大旗,架设通向文学新潮桥梁的梁启超;

运用西方美学理论,第一个试图建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王国维;

博大精深,以其深刻而具有悲剧意识的作品开创中国文学新时代的鲁迅;

最早倡导新文化运动,开现代文学思潮风气之先,终生被人褒贬不一的胡适;

高张“人的文学”旗帜,震惊“五四”文坛的周作人;

激情澎湃,“五四”时期的浪漫派诗人郭沫若;

目光宏阔,全神贯注,关心中国与世界文学思潮涨落的茅盾;

以其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品征服几代读者的巴金、老舍、沈从文;

性格固执而又刚烈,在文学理论上独树一帜的胡风;

学贯中西,以学者兼作家的睿智,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创作中融为一体的钱钟书;

热心译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对当代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周扬。

上述思潮十四家,他们或以其理论成果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

^① 《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第233页,刘象愚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历史进程,或以其具有经典性的潮头作品开一代文风,功勋卓著,成绩斐然。尽管他们也各有其时代局限,但却集中地代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走过的艰难悲壮历程。正确评析这些历史人物,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发展基本线索的理解,当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或许也可以这样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向往于在整体把握基础上的重点突出的描述。本书所论述的,只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作家集团和文学运动。我们没有包罗万象的奢望。一些在文学思潮发展中当时虽曾掀起过微波细浪,但对本书宗旨并不显得特别重要的文学现象,我们也理所当然地予以舍弃。在每位文学研究者面前,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世界,本书只是我们眼中的文学世界。我们并不过分强调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容的巨大包容性。我们只是从文学思潮的视角,向读者诉说自己对感受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文学现象的理解。作为一部篇幅较大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虽然在主编的主持下,对全书的总体思路与体例多所商讨,学术观点也大体近似,但是,由于本书成自众手,每位撰稿人总会带有个人的学术特色,我们并不追求观点和认识的绝对一致。至于结构、风格与行文,更是见智见仁,鼓励每位作者使用其顺手器械,而不计较板斧与棍棒孰优孰劣。

早在 20 世纪之初,梁启超就曾经预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充我宗也。”^①虽然 20 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汇、交流、融合、吸收历尽曲折,“两文明结婚”所呈现的复杂态势远远超出了梁氏的想象,但是,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确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文学撞击所诞生的宁馨儿。仅就这一点而论,梁氏确为 20 世纪具有开放品格的预言家。我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 年),《饮冰室全集》第 19 册,中华书局 1916 年版。

们相信,在 21 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将会在更高层次上开始新的融合,我们呼唤中国文学更为健壮的宁馨儿早日呱呱坠地。

引言 人文主义的晨光与 古典主义的末路

关爱和

15、16世纪的西欧,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冬眠”之后,开始了新的生命复苏。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旗帜的人文主义思潮,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中世纪神本主义、蒙昧主义的污泥浊水。人文主义者反对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憎恶神学中的禁欲主义,抗议封建制度的束缚。他们呼唤人们把目光从神转向人,从天堂转向尘世。他们认为人生而平等,个性自由不可侵犯,现世幸福高于一切;享受平等、自由、幸福是人普遍具有的自然本性,而这种自然人性在黑暗的中世纪被长期地压抑和埋没了,现在需要得到重新发现与肯定。人文主义的兴起,把人们从虚幻的神学彼岸世界引回到现实的自然界和有血有肉的人间,拉开了西方近代革命的帷幕。此后,经过天翻地覆的宗教改革和震撼人心的科学革命,西欧各国渐次步入近代化的社会历史进程。

在西方近代革命拉开帷幕的同时,位于世界东方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的中国,也掀起了具有近代意蕴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批身处明代末叶、敏感而富有朝气与战斗精神的思想家,勇敢地向封建专制和思想权威发起攻击,反对无所不在的天理对人的感性欲望的摧残与压抑,呼唤心灵与情感的自由,主张将世间的伦常道德,建立在个人幸福、快乐的身心基础和现实生活之上。晚明思想运动,是与欧洲人文主义精神十分相似的文化思潮。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形态、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晚明人文主义的晨光,并没有迎来与中世

纪的挥手告别,并没有为古老的东方帝国,叩开近代工业革命的大门。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明朝灭亡,清主华夏,改变了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文化的流向。生活在易代之际的中国士人,在亡国之痛心境的支配下,以正本清源、博学求实的努力,扭转了晚明士人放浪佻达、空谈心性的学风、士风,形成了以复原、束结、引古筹今为基本指向的启蒙主义文化思潮。抱有向儒家本源文化复归之初衷的清初启蒙主义文化思潮,在清政府政权机制的引导、干预下,渐次失去了启蒙的灵魂,成为宗经、征圣、复古气氛浓烈的文化古典主义。鸦片战争的爆发,促使中国士人再次从空疏的性理思辨与烦琐的训诂考据的迷梦中惊醒,救亡反帝、启蒙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迫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断在反省中调整自己的心境与文化选择。他们在沐浴欧风美雨的同时,也在本民族本源文化中积极寻求思想原型与精神支撑。这样便有了辛亥革命时期以前对清初启蒙思潮和“五四”时期对晚明人文思潮的选择与认同。从晚明到“五四”,历史在螺旋式递进中划出了一条充满曲折与回应的轨迹,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富特点和耐人寻味的文化过程。

一 晚明市民文化运动与 尊己向俗的浪漫激情

商业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市民意识的崛起,禅、道、儒三教的融合与世俗化倾向,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双水并流,心学渐次取得优势地位,是晚明思想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与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结构,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发展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只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形式。16世纪前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商业日趋繁荣。国内除明代以前已经形成的大中城市外,在江南以及东南沿海的运河沿岸,又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城镇,并形成了不少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如徽商、晋商)。在种种社会和